

◎ 主 编 尹 邦 奇
◎ 副 主 编 张 申 芬

科技奖励在上海丛书

● 上海市科学技术奖励中心

星光灿烂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科技奖励在上海丛书

● 上海市科学技术奖励中心

星光灿烂

主 编 尹邦奇

副主编 张申芬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科技奖励在上海丛书: 星光灿烂 / 尹邦奇主编.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8. 12

ISBN 978-7-5323-9527-9/N. 274

I. 科… II. 尹… III. ①科学研究事业—概况—上海市
②科学家—传记—中国—现代 IV. G322.751 K826.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110030号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上海钦州南路71号 邮政编码200235)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15 插页8

字数: 237千字

2008年12月第1版 200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 300

定价: 38.00元

本书如有缺页、错装或损坏等严重质量问题,
请向工厂联系调换

《科技奖励在上海丛书》编委会

顾 问 钮晓鸣 陈 杰 张肇平

主 编 尹邦奇

副主编 张申芬

编 委 吴洁敏 路继根 包 豫 陈 阵

顾维英 窦海青 顾旭峰 常艳丽

序

在全国科学大会召开 30 周年的今天,上海市科学技术奖励管理办公室、上海市科学技术奖励中心组织出版这套丛书,十分有意义。

1978 年,党中央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现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同年,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等著名论断。那年,神州大地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也迎来了“科学的春天”。

中国改革开放走过了 30 个春秋,中国的科学技术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科学技术进步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逐年上升。申城日新月异的变化是与上海及全国科技工作者的创新奉献息息相关的。

这套丛书由“星光灿烂”、“万紫千红”、“春雨沃土”组成。出版这套丛书的意义就在于,向社会宣传我国已经从“科学的春天”走向“建设科技创新型国家”的征程。这 30 年来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国家推出的各项科技奖励政策激励了越来越多的科技人员勇于创新、努力创新,为祖国为人民多作贡献。“星光灿烂”与“万紫千红”向社会公众推介 2000 年以来在“科教兴国”、“科教兴市”中取得突出成就并已获国家、上海市科学技术奖的获奖者代表和他们的创新团队,让全社会了解他们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操和为中华民

族争光的远大理想,了解他们甘于寂寞、矢志不渝的执著,以及献身科技创新、建设现代化的热情。“春雨沃土”介绍了科技奖励的基本概念、评审程序、报奖材料的撰写方法,为科技人员科学、准确、通俗易懂地表达报奖科技成果的内容和水平、知晓科技奖励政策提供指南,让优秀科技人才和成果更好地得到社会的认可和肯定。这将有利于在全社会形成崇尚科学、尊重知识、鼓励创新的良好风尚。

今天,我们正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缩小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争取早日建成小康社会,这必然需要越来越多的后来者。

申城众多的资深新闻工作者与作家们第一次就这一主题展开大联手、大合作。他们在各领域科学家的支持下,克服种种困难,努力以真实生动的文字描述、深入浅出的科普诠释,立体地反映出攀登科学高峰的科学家们的真实形象与思想境界。他们的目标是尽可能让公众与科学家作零距离接触。

让公众走近科学家、走近楷模,希望更多的有志者能从他们的创新故事、创新精神、创新思维、创新方法与奋斗过程中得到启迪,以积极向上、努力进取的姿态,融入创新型国家的建设之中。

科学技术的星光,必将把神州大地照耀得更加灿烂!

葛子琪

2008年8月

目 录

- >>> 1 序
- >>> 3 感动中国 医界第一——吴孟超传
- >>> 55 一个甲子的寂寞长跑——蒋锡夔传
- >>> 85 数苑英杰——谷超豪传
- >>> 115 开往春天的地铁——刘建航传
- >>> 147 寻找无形的“套”——张永莲传
- >>> 177 征战“癌症王国”——汤钊猷传
- >>> 205 清晰的轨迹——张文军传
- >>> 231 后记



吴孟超 中国科学院院士、医学家

吴孟超,生于1922年8月31日,福建闽清人。1927年随家移居马来西亚,1940年回国求学,1949年毕业于同济大学医学院。现任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院长、东方肝胆外科研究所所长,还担任中国癌症基金会副主席、军队科技委员会常委、中德医学协会副理事长、原中华医学会副会长等学术职务。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他是我国肝脏外科的主要创始人,国际肝癌研究的重要开拓者。提出“五叶四段”肝脏解剖学理论,发明肝脏手术及止血的新术式、新方法,如“常温下间歇肝门阻断”法等。率先成功地施行以中肝叶切除为代表的一系列标志性手术,创立并发展了我国肝脏外科学术体系。在肝癌的早诊早治和基础研究方面,以及在晚期肝癌和肝脏移植,乃至肝癌的免疫、生物导弹与基因治疗方面,取得了一大批高水平成果。上述研究使肝癌术后五年生存率从20世纪60年代的16%上升到90年代后的53.2%。近年又研制出两种肿瘤疫苗,发明携带抗癌基因的增殖性病毒载体等。多项成果已发表于美国的《科学》等世界著名学术杂志。

发表学术论文801篇,主编专著15部,获多项国家、省部级奖励,并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创建并领导的医院与研究所已成为国际上规模最大的肝胆疾病诊断中心和科研基地。在他和同行的努力下,我国在肝脏外科领域的研究与诊治水平居国际领先地位。

1996年,中央军委授予“模范医学专家”称号。

2005年,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感动中国 医界第一

—— 吴孟超 传

我这双当年在南洋拿过割胶刀的手,今天能操起手术刀攻克肝癌顽症,完全是党和人民培养的结果。这个殊荣不仅属于我,也属于我们肝胆外科的全体同志,属于中国肝胆外科事业。

—— 吴孟超

历经坎坷,割胶少年萌生报国志

福建省东部,在那群山环抱的平原中有一个小小的闽清县城。湍急的梅溪水带着山土的清香,在此汇入滔滔的闽江。山清水秀的闽清,出了一位被世人誉为“当代华佗”的大医家——吴孟超。

1922年农历七月初九,在闽清县白樟乡的一座农舍,“呜哇……”婴儿的第一声啼哭打破了笼罩在山谷中的寂静,接生婆把通身发红的新生儿交给了久候在旁的奶奶,又出门向正蹲在门外的男子报告:恭喜啦,是个男孩!

刚当上父亲的庄稼汉,进屋取出早已准备好的鸭蛋和万寿果等,按照当地习俗,供奉在神像前。他虔诚地祈求上苍,保佑儿子长大后不再受穷。这个男婴后来入学时取名为孟超,小名阿秋。

按中国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的习俗,长子是最受宠爱的,但由于家境贫寒,

那孩子始终处于半饥半饱中，到3岁还没能下地走路。

等到第三个孩子出生时，吴家已是一贫如洗。万般无奈的庄稼汉与妻子商量着下南洋挣钱，不久就与几个同乡登上海船，这一走就是两年。

年轻贤淑的母亲，拖着三个孩子，说多艰难就有多艰难，多亏娘家兄弟常常来帮衬。

儿时的岁月里，舅舅是最受孩子们欢迎的人。小阿秋常坐在家门口，盼着在山路的那一头，会出现肩头扛着竹竿的舅舅，竹竿后端挂着一长串田鸡。被剥了皮的田鸡在竹竿下方晃动着，时不时还能看到田鸡腿的抽动，这不仅好玩，而且是一顿美餐呐。

正因为心疼外甥瘦得皮包骨头，舅舅每趟来总要先到秧田里捉些田鸡——青蛙，供甥儿补养身体。母亲后来常告诉儿子：没有舅舅，你真是熬不过来呢。

怀里抱一个，背上背一个，手里还要牵一个，既种田又持家，母亲累得实在撑不下去了，想来想去，只有去南洋找打工的父亲。

听说要出门，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小阿秋很兴奋。临行前的晚上，他在床上翻来覆去，一个劲地想，爸爸该是什么样子呢？父亲离开闽清时，他实在太小了，因此怎么也想不起来爸爸的模样。

母亲在油灯下整理着衣物，她与舅舅都心事重重，异国他乡的日子还不知有多难哪！

昏暗的灯光晃动起来，舅舅摸出几块还带着体温的光洋，硬是塞到母亲手中，千叮万嘱：“那儿天气热，阿秋他们小，可别热出病来。到了那儿要赶紧捎信回来，免得家人着急。”母亲不断“嗯……嗯……”地答应着。听着，听着，母亲和舅舅的声音变得越来越远了。怀着对重逢的向往，小阿秋渐渐进入了梦乡。

翌日，天刚蒙蒙亮，浓浓的山雾在山间弥漫。母亲背着还在睡梦中的小弟弟，舅舅背着阿秋，匆匆走进了浓雾中。

舅舅把他们一直送到闽清县城，又送上船。

“呜……”随着沉闷的汽笛声，船缓缓离开了码头。

顺风顺水，船行很快。小男孩趴在船边，看得入神，岸边的土屋缓缓后退。船越往前，江面越开阔，闽江两岸那熟悉的大山不久也消失在视线之外。傍

晚,船近了岸,听母亲说,“马尾”到了,我们还要换乘大轮船。

跟着母亲上岸,阿秋第一次看到了高耸的楼房、有着四个轮子的汽车,觉得十分新鲜。

几天后,母子三人挤上一艘大船,这艘船的船舱有好几层。可是一上船,衣着寒酸的人们都被赶到甲板下的统舱里。那舱里没窗户,加上人又多,空气浑浊不堪。轮船行驶在大洋上,风浪一起,船便颠簸得厉害。于是,有人晕了,有人吐了,酸臭味充盈于船舱的每一个空间。母亲带着小兄弟俩一直缩在一个角落里。

闷在统舱里的人们,昏昏沉沉也不知过了多少天。“到了,下船了!”一声声吆喝使已经支撑不住的人一下子来了精神。大船在“北婆罗洲”靠了岸。大家一上岸,小男孩便听见有人在大声呼唤母亲的名字。终于一个瘦瘦的中年男子挤到母子们面前,一把抓住母亲的手。母亲擦着泪水让小兄弟俩喊“爸爸”,望着眼前一张陌生的面容,小男孩直往母亲身后躲,经再三催促,他才怯生生地叫了声“爸爸”。父亲“哎”了一声,便紧紧地搂住了男孩,在他的脸上亲了又亲。

父亲打工的地方是“北婆罗洲萨拉瓦国诗巫坡”,那里就是今天马来西亚东北部沙捞越的诗巫。诗巫是马来文 Sibn 的中文译音。小城镇地处热带,早年种植的橡胶林逐年发展,颇成气候,橡胶的开采需要劳力。于是,各地劳工闻讯纷纷跋山涉水来到此地。

下南洋的华人劳工大多来自福建,不少人进橡胶园当了割胶工,小阿秋的父亲便是其中的一个。

华工素以勤俭著称,童养媳出身的母亲是干活的一把好手。一到诗巫,她喂猪养鱼,忙个不停。看到好吃米粉的福建人来得多了,又做起了米粉生意。小阿秋刚来不久,便成了父母的好帮手。半夜母亲舂米,6岁的阿秋便站到舂杆上加重量,一上一下地随杆跳跃着,直到天亮。

一家子起早贪黑,好不容易攒下点钱,买了几亩橡胶园。常年受不识字之苦的父母,咬咬牙送阿秋进了当地的华侨学校。从此,学校的花名册上多了个学生“吴孟超”。自9岁那年,吴孟超开始了半天割胶、半天上课的生活,就此告别了童年时代。

凌晨,当吴家那座老式座钟刚敲两下时,父亲便会推醒小孟超。男孩揉着



双眼，提起油灯，走入橡胶园中。

青白色树身的橡胶树一棵接着一棵，只见他拿着割胶刀在树身上割开一条不到1厘米宽的斜口，约三分之一树身周长的树皮掉了下来。“笃，笃”几下，小孟超翻过刀柄把一块铁皮安在斜口边缘，胶液沿着这个通道滴入下面用来接胶的胶杯中。他一口气做完这些动作，飞快地跑到下一棵橡胶树前，又举起割胶刀划树皮。一百多棵树割完，天才蒙蒙亮。

小孟超回家吃了早餐，再进胶林收胶，把收回的胶液分盆凝固，忙完了这个才去冲凉，匆匆午餐后又急急赶往学校上课。放学后，他到家第一件事就是点燃火盆，把半干的树胶烘到干透，准备以后挑担上市出售。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转眼时光走过了整整八年，小孟超也长成了英俊的青年，他在橡胶园练就了一手好刀法，也在当地华侨办的光华学校里受到了爱国的启蒙教育。

1939年秋，诗巫光华初级中学的公告栏前，一群半大不小的中学生排着整齐的队列，聆听老校长的毕业致词。光华中学建校以来第一遭，在公告栏前举行隆重的毕业典礼。公告栏上，贴着一纸以正楷大字抄写的电文。校长告诉大家，这份来自延安的电报，乃是以朱德、毛泽东的名义，发给你们——光华初级中学第39届毕业生的感谢电。

一张张还显稚嫩的脸庞沐浴在热带炎炎的阳光下，一个个青年的胸膛里涌动着同仇敌忾的爱国热情。站在队列中的班长吴孟超心情分外激动。几个月前，在他的提议下，全班同学把毕业聚餐的钱作为抗日捐款，辗转送到了延安。

光华初级中学的校长是位爱国华侨。当年，他请孙中山先生亲笔题写了校名。“光华”取的就是光耀中华之意。尽管诗巫处于英国殖民者统治之下，但老校长暗地里总是教育孩子们牢记中华文明，不忘祖国，不忘自己的“根”在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师生们又是上街宣传，又是义演募捐。老校长与南洋爱国侨领们在孩子们心中播下的爱国种子，慢慢发了芽。正是出于对前方抗日将士的敬意，所以出现了“北婆罗洲萨拉瓦国第二省诗巫光华初级中学第39届全体毕业生”捐款的一幕。

此刻，吴孟超与六位志同道合的同学已下了决心：回国参加抗战，报效祖国。

1940年初,17岁的吴孟超在码头上告别了亲人,与伙伴们登船回国。在海上航行十多天后,他们在安南的西贡上岸,准备在此换车去云南。

青年吴孟超在西贡经历了一场屈辱的洗礼。

西贡就是今天越南的胡志明市,当时它属于法国殖民地。

进西贡得过海关,人们排着长长的队伍等候签证。排了整整半天才挨近签证桌的吴孟超,刚提笔欲在入境登记表上签名,一个安南警察上前用广东话对他说:“中国佬,要盖手印,不能签字!”吴孟超转身用英语对法国签证官说:“我是中国人,能用中文或英文签字。”那矮胖胖的法国人满脸不屑:“不!这里规定,黄种人一律要盖手印!”还出口侮辱中国人是“东亚病夫”。一腔热血冲上青年人的脑门。然而,伙伴们一阵据理力争的结果,竟是被七八个安南警察逐出队伍。

最后,为了进关,这群青年只能万般无奈地把手指伸向红色的印泥盒。这一奇耻大辱深深地烙在了吴孟超的心口上。

经过老街的边境桥踏上祖国土地的那一刻,吴孟超发誓一定要学好本领,报效祖国。他相信“总会有我们中国人扬眉吐气的一天”。

当年8月,一时无法去延安的吴孟超听从先期回国的西南联大同学的劝告,决定留在大陆读高中,同来的伙伴们也都在昆明入学了。

同窗结同心,生命从此与医学结缘

1940年8月,吴孟超考进了流亡到昆明的同济大学附属中学,这是一所不用付学费的国立学校。在同济附中,他认识了后来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江南少女——同班同学吴佩煜。

吴佩煜,来自中国的“人间天堂”——杭州西子湖畔。秀外慧中、皮肤白皙、热情活泼的吴佩煜是家中的独生女,父母的掌上明珠。父亲吴尧叔是一名铁路部门的职员,长年随着铁路修建到各地工作,他曾带着妻子沈蕴琴和女儿佩煜从湖南长沙、衡阳辗转转到广西桂林。此时,又因修筑滇缅铁路,举家迁到昆明。聪明的佩煜到昆明后不久,就考取了同济附中,那里的学生毕业了可以直接上同济大学医学院。穿上白大褂,当受人尊敬的医生,这是父亲吴尧叔对女儿的期望,也是少女佩煜从小憧憬的理想。

1941年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同济附中从宜良县的狗街搬到昆明市区。昆明是云南省政府所在地,日寇的飞机三天两头飞来轰炸。每当空袭警报一拉响,学生们马上出门“逃难”,书包是早就准备好的,随时可以背上就走。战时的昆明,可以说,人们天天都生活在一级戒备中。

有一次,同济附中的同学们躲到一个地方,看看不太安全,又奔到另一处躲藏。刚刚蹲下去,只听轰鸣声越来越近,机翼上有着红膏药标记的飞机猛然俯冲下来,立时爆炸声起,震耳欲聋,同学们恐怖得不敢睁开眼睛。等到烟尘散尽,大家发现原先的藏身处竟然已被炸成了一个大坑。

虽然已进高中,但是男女同学之间平时并无交往。后来经过逃难和其后的学校长途搬迁,处于生死旅途中的同学渐渐打破了男女隔阂,彼此有所了解,慢慢建立起友谊。在危难时刻,作为班长的吴孟超更是身先士卒,主动帮助和照顾弱小的同学。他自小生长在农村,吃苦耐劳,乐于助人,又有较强的独立生活能力,给吴佩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与马来西亚的联系中断。原本拮据的吴孟超一下子陷入困境:来自马来西亚家中的菲薄的生活费没有了。从马来西亚同回祖国的伙伴们先后因故退了学。然而,一心求学以报效祖国的吴孟超不想半途而废,他决定边打工边读书。他课余上街卖报,晚上当家庭教师,还跑到机关去抄抄写写,拿点临时书记员的补贴,只是所得无几,生活十分艰难。正在此时,温柔善良的女同学吴佩煜向他伸出了援手。她省下零花钱悄悄地代吴孟超买灯油、买笔墨纸张,见到吴孟超衣衫单薄,她又亲手为他编织了一件毛衣,她在尽自己的力量主动给吴孟超一些帮助。这一次又一次的帮助,对吴孟超真是“雪中送炭”,常令吴孟超铭感于心。

1942年暑假,同济附中从昆明迁往四川宜宾,沿途有一段只能搭坐运货的大卡车。山陡路险,同学们坐在行李上一路摇摇晃晃。放眼望去,公路外侧多为断崖峭壁,稍有闪失,就可能掉入万丈深渊。吴孟超一路给同行的吴佩煜壮胆。五天后,大家到了四川泸州,又改乘木船逆行向上前往宜宾。沿途的互相体贴照顾,使两颗年轻的心靠得更近了,渐渐地撞击出爱情的火花。

1943年夏,吴孟超与吴佩煜高中毕业,准备报考同济大学,但在专业选择上产生了分歧。吴孟超一心想读工学院。他从小爱动手,八年的割胶经历不仅使他的割胶手艺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而且使他雕刻编篮无一不通。更

何况，“富国强民工为先”。吴佩煜则从小受父亲的熏陶，铁心要当个白衣天使，她渴望吴孟超能和她一起实现这个美好的理想。但是她说，若是吴孟超一定要学工，她就弃医学工好了。

终于，爱情的力量使吴孟超心目中的天平从“工”倾斜到“医”这边。他在吴佩煜的陪同下，到校务处改填了志愿。爱神，在无意中改变了吴孟超的人生轨迹。

大学六年，吴孟超与吴佩煜互相帮助，互相勉励。学业与爱情相长，两人双双成了班里的学习尖子。

1949年，他们从同济医学院毕业。

多少年以后，提起九年的同窗生活，吴佩煜说：是“逃难”把我们“逃”在一起了；吴孟超则明白：是佩煜，使我走上了学医从医之路。

1951年，元旦后的一个中午。

位于南京路的上海第一高楼——国际饭店，迎来了一群年轻人。他们嘻嘻哈哈地簇拥着一对新人上了二楼咖啡厅，服务生们忙着给四桌客人上西点、送咖啡。大厅里充溢着咖啡与奶香，欢笑声此起彼伏，一场别具一格的西式婚礼开始了。

在大红囍字下，新郎吴孟超与新娘吴佩煜向客人们深深地鞠了一躬，大家以咖啡代酒，祝新人白首偕老，百年好合。

新郎与新娘心中十分激动。为了不惊动大家，他们上民政科登记也是悄悄地去，可同窗好友硬是要给他们办一场“盛大”的婚礼。

1949年初夏，从同济医学院毕业的吴佩煜，很快通过同学介绍，进了上海第一妇婴保健院。吴孟超领到毕业证书后，颇费了一番周折，两个月后他才进了华东人民医学院，成了一名外科医生。

吴孟超工作如愿以偿，可烦恼也来了。“一妇婴”在上海市内，华东人民医学院却远在市郊地带的江湾五角场，两处相隔几十里地。两人各住各的宿舍，加上当时电信、交通都不发达，既没电话，乘车也不方便，见个面得事先约好，大家会聚到四川路底，相会不是在海宁路一带“压”马路，便是在医院食堂坐一坐。住院医生又是24小时值班制，一个月也难得有两人同时休息的。于是，见一回面常有点鹊桥相会的味道。一来二去，一晃就过去了一年多，两人都已经二十七八了。俗话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在当时这年龄够得上大龄青

年了。一头钻在事业里的两位没着急，同窗们倒是都急着催了。商量过后，两人就一面向院领导打结婚报告，一面物色婚房。

说来也巧，吴孟超的一位同乡，是他的远房亲戚，刚好要回鼓浪屿一段时间。听说他俩为婚房发愁，一口答应把市区“花园坊”自住的一楼客厅连家具一起暂借给他们。只是好事多磨，那时华东人民医学院改名为第二军医大学（下简称“二军大”）。大家没料到部队医院有条不成文的规定，凡在住院医生阶段，不管男女都不准婚嫁，结婚报告给退了下來。

当吴孟超与其他住院医生提到此事时，大家都觉得院方这个规矩不符合婚姻法，还鼓动他们先行一步。不久，大胆的吴孟超出人意料地做了个小动作，他不声不响地带吴佩煜上了区民政科。登记结婚居然“先斩后奏”，此举当然要受处罚。虽说没过半年就撤消了，但这是吴孟超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违纪。后来，医院取消了这个不成文的规定，其他住院医生也都相继结婚了。

得知他俩手头拮据，同窗好友们便一起商量如何操办他俩的婚事。最后，在同学沈医生的倡议下，每人掏出四元钱，挑了上海最豪华的酒店国际饭店订下了咖啡厅，办了一场当时极富创意、挺有排场的婚礼。典礼一结束，大家又前呼后拥、热热闹闹地把新人送入附近的“花园坊”新房。

婚后的生活既甜蜜又艰苦。老乡回沪，他们又搬回各自的宿舍里。不久，佩煜怀孕了，可她一声不吭，照常上班，整天还忙个不停。“一妇婴”当时医生少，住院医生就两位，工作特忙，结果她怀孕才7个月孩子就早产了。同学们一面忙着通知在江湾的吴孟超，一面急急地上街买婴儿衣服、抱裙、尿布，等到吴孟超赶到市区，女儿吴玲已经呱呱坠地，早产儿在医院婴儿室足足待了半年才被接回家。

尽管妈妈是妇产科医生，深谙母乳喂养对婴儿生长发育最好，可是一上班又是连轴转，她没有办法天天回家哺乳。于是，孩子就放在江湾家中，吴孟超只好又当爹又当娘。居室实在太小，当夜幕降临后，保姆在走廊搭铺入睡，他就在卧室里一手摇着摇篮，一手翻阅资料，常常是婴儿入睡了，他的病历资料也整理好了。

每逢佩煜回家，两人忙完了活，话匣子一打开，话题除了女儿外，小两口交流起从医的心得，倒也是没完没了。

1952年9月，退休后住在昆明的老丈人吴尧叔，听说已经有了两个外孙